

成功的失敗者——

張學良

傳

別樣恩仇

別樣恩仇

情感定位

國恨家仇未報，同根萁豆相煎。

將軍一怒髮衝冠。抗日臨潼兵諫。

本是恩將仇報，還玩結契金蘭。

梟雄手眼不新鮮。一味癡迷堪歎！

《西江月》詞一闕，說的是千古功臣張學良與大獨裁者蔣介石的恩仇舊事。

一位偉大的哲人說過：

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，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，總是採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，這種思索是從事後開始的，是從發展過程完成的結果開始的。

那麼，我們也就從當事人的「事後結果」說起。

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，由於心臟病突發，蔣介石在臺北士林官邸去世，終年八十九歲。囚禁中的張學良聞訊後，陷入了久久的沉思。想到自己與這位逝者近半個世紀的恩怨仇讎，不禁心潮翻湧，百感交集。

真沒料到，在他長達一個世紀的生命途中，竟有一多半時間是在這位雄鷲而殘忍的強勢人物的支配下度過的。由於這個人的存在，他的盛衰榮辱，包括整個生命的軌跡，都發生了截然的改變。西京之役，是他的命運的轉捩點，「攪得周天寒澈」，也「閱盡人間春色」。

須知，蔣介石這個大獨裁者可不是好對付的，一貫翻手為雲，覆手為雨。為了實施報復，先是按照國法判了張學良十年徒刑，可是，又一轉念，覺得不妥——十年過後，這員虎將也才四十多歲，正當壯年，放出來那還得了？於是，又變了個招法，改用「家法」來加以管教。一則，可以蒙上一絲脈脈溫情，彰顯二人之間的特殊關係，讓他人不好說話；二則，從此可以監禁終生，直到垂垂老死。這些，在他人眼中都是洞若觀火的「陽謀」，只是，張將軍卻沒有看出個中機竅。「梟雄手眼不新鮮，一味癡迷堪歎」。

且看他送給蔣介石的這副輓聯：

關懷之殷，情同骨肉；

政見之爭，宛若仇讎。

據說，早在一九四八年，張將軍初到臺灣井上溫泉時，即曾寫下了「愛護之深」、「關切之情」、

「國事之爭」、「幾同參商」等語句，塗塗改改，斟酌過許多次；到了蔣介石去世，這副輓聯正式成稿，足足運思了二十七年之久。可見，這十六個字並非率爾操觚的產物，其間的蘊涵還是足堪玩味的。

這裡，張將軍集中表述了他同蔣氏的特殊關係。其特殊的程度，竟至於我們很難加以準確、鮮明地定位——

想當年，張學良手握三十萬重兵，身為北半神州的一方霸主，其角色與身分，儼然與「江湖老大」的蔣介石平起平坐、平分秋色。他既不同於一般的軍閥，更有別於蔣氏的普通部下、一般僚屬。此其一。

發展到後來，蔣、張二人，在最高統帥部，一為正職，一為副職，又成了上下級關係；可是，由於張學良在東北「易幟」和協調中原大戰這兩個至為關鍵的時刻，曾經對蔣氏施以有力的援手，甚至可以說是拯危救溺，恩同再造，因而，他在世人心目中，尤其是在蔣氏的心目中，具有他人無與倫比的獨特地位。此其二。

在此後的八年間，張學良「一切唯蔣之命是聽」，可說是蔣家王朝最賣力、最聽話的忠臣良將。耿耿丹心，推誠相與，「愛護介公，八年如一日」。即便最後為了一致對外、團結抗日，被逼實行「臨潼兵諫」，其最終目的也不是要把蔣氏打倒。此其三。

其四，他們曾結契金蘭，訂下「手足之誼」；有人甚至說他們不啻父子關係，比如，國民黨元老邵力子就有「蔣張二人是家長與子弟關係」的說法。不過，若是從蔣介石的角度來看，這種「父子關係」說，是根本站不住腳的。郭軍反奉期間，由於少帥與「大逆不道的郭鬼子穿一條褲子」，

劃不清敵我界限，老師張作霖也曾把他罵得「狗血噴頭」，最後又演出「轅門斬子」、「劉備摔孩子」的鬧劇。可是，明眼人都看得出來，這是做給旁人看的，骨子裡浸透著純真的父愛。那麼，且問：西安事變之後，蔣介石對張學良也是如此嗎？

「關懷」

當然，就張學良自己來說，也可能確曾存在過這種想法。我們不妨聽聽他在「口述歷史」中是怎麼講的：

老先生對我還是不錯的了。我不是說過，他死了我寫了副對聯嘛，我這是私人的對聯，我吊他的。我說：「關懷之般，情同骨肉；政見之爭，宛若仇讎。」老先生對我，那是很關懷的。我有病，差不多夠嗆了，他們旁人就想，我要死掉了。那他不但特別關切，還派了醫生，派了中央醫院的來看我……

蔣先生是原諒我了，不原諒我，他不把我槍斃呀？我到南京是預備被槍斃的，我是應該被處死刑的，我是個軍人，我懂得。我也是兵，也帶過部下。假設我的部下這樣，我就把他槍斃了……說實在的，蔣先生對我，我暗中想，他對我也相當看得起。覺得我有種？這話倒不敢說，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戰他的權威，我損害了他的尊嚴……

我當時就說，好像燈泡，我暫時把它關一下，我給它擦一擦，讓它更亮。實際上我這樣做，他不是更亮了？

我們在解讀這副聯語時，遇到的一個首要問題，就是：這裡說的「關懷」，究竟作何讀解？從張將軍本人的口述中，自然可以得出結論，那就是蔣氏對他是真心關懷的；也就是說，聯語中表述的正是作者本意，發自作者內心。以張學良的坦蕩胸懷，以他的忠恕之道和與人為善的天性來說，他這樣說、這樣做，都是情通理順的。

但是，這樣一來，人們馬上就會產生疑問：難道世間竟有這樣關懷的嗎？而且竟是「之股」，竟是「情同骨肉」！不關懷，又將如何？難道只有殺頭才是不關懷嗎？百般困惑之餘，有人代為求解，認為應該考慮這樣一個背景——雖然張將軍說弔唁是私人性質的，但他清醒地曉得，悼詞最終必然公之於眾，不宜刻薄、蹊刻；特別是，當時還處於拘禁之中，先主雖逝，後主還在，因此，他不能不存有某些顧忌，因而免不得會夾帶一點冠冕堂皇的成分。而到了十多年後，在作「口述歷史」時，也不便改口了，似乎也沒有必要改口了，於是，順水推舟，就這樣過來了；況且，留下一個「忠恕」的美名，對他也並沒有什麼壞處。

後一因素儘管不能完全排除，但我以為，就張將軍當時的心境來揣測，主導成分還是前者。張學良之所以為張學良，其實正在於此。

可以說，對於蔣介石的雄猜、鷙狠、陰險、多疑、耍手腕、弄權術的「人性暗箱」，張學良自始至終都沒有真正地弄明白。因而，他一路地赤誠相與，一路地獻身賣力，一路地吃虧上當，嚐盡了苦頭，最終仍然執迷不悟。

從本性上講，兩人就迥然有異，甚至是判若雲泥。張學良正而不詭，蔣介石詭而不正。二人的出身、閱歷完全不同。蔣氏自幼混跡於十里洋場，隻身闖蕩江湖，從最底層一步步地爬了上來，歷

盡人世風波，長於應付艱危局面，最後練成了「通天老狐」，謀深慮遠，陰險叵測；而張學良出生於富貴人家，「年少萬兜鍪」，萬事皆能順其心志，無須刻意經營，即可達致仕途通顯；又兼他在接納「孝悌忠信」儒家文化的同時，深受西方文化之薰染，因而，少了些磨煉與韌性，多了些張狂與曠達，為人處世，逞義氣、重名節、講感情，相對單純、率真一些，有時耍一點小聰明，即所謂「點慧」，而缺乏更深遠的謀略。

在張學良的字典裡，似乎沒有「機心」二字，什麼狡獪、權謀、暗算、防範，好像都與他毫不相干。他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，輕易地委信於人。對於蔣介石，他就正是這樣。即使到最後，他也還是對蔣氏作「有大略，無雄才」的評價，以「才智」作為衡人標準，而無涉於品格、人性、倫理道德。因為他不懂得這一套。而長於政治權術的蔣介石，則恰恰與之相反。

說到二人之間「宛若仇讎」的「政見之爭」，他在「口述歷史」中說：

我的判斷，他對我討厭極了。所以，後來不能讓我自由。他心裡第一敵人是共產黨，而我的第一敵人是日本。……其實，我跟蔣先生兩個人的衝突，沒有旁的衝突，就是衝突這兩句話：他是要「安內攘外」，我是要「攘外安內」。

看來，根本之點在於如何對待「抗日」和「剿共」上。這一矛盾、衝突，貫穿於從東北「易幟」到「西安事變」的整個過程之中。

交往三階段

細按張學良與蔣介石的「交情」，客觀地看，可以分為三個階段。

從東北「易幟」擁蔣，到協調中原戰事助蔣，為「蜜月期」，這是兩人關係最為密切的時期。在他們磕頭換帖，結為「把兄弟」的同時，于鳳至與宋美齡也結拜為姐妹，于稱宋母為「乾娘」。隨著就任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，張學良便駐節北平，節制冀、晉、察、綏、遼、吉、黑、熱八省軍事，權力與地位到達了巔峰。

爾後，逐步進入了「摩擦期」，中經「九·一八」事變、熱河失守，張學良被逼下野，歐洲考察後復出。

最後是「交惡期」，一方要「剿共」，一方要「抗日」，結局為臨潼兵諫，捉蔣放蔣。

與此相對應，蔣介石對於張學良及其麾下的東北軍，始而拉攏、利用，繼則遏制、削弱，最後分化、剝奪。總之，「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」，從來也未曾像對待他的嫡系那樣真正地信任過。

應該說，張學良對於蔣氏的倚重與信賴，以至後來的「敲打、教訓」，絕非源於私人情感上的好惡，或是出於個人的利害權衡，而是出自對國家命運、民生疾苦的關心，他從小就渴望國家統一、民族復興。他說：

良年方弱冠，屢參戰事，親見因戰亂原因，滿目瘡痍，民生凋敝，自己同胞互相殘殺，而有為有志之青年，多為犧牲，大傷國家元氣，衷心實為懺悔。

作為嶄露頭角的青年將領，他在軍閥中首倡罷兵息爭。在多次諫諍父帥未能如願的情況下，憤懣不已，決心「一旦掌權，要儘量避免無意義的戰爭，要利用自己的機會和優勢，盡力為國家的和平與統一做點什麼」。但他並沒有分疆割據、獨霸稱王的野心，無論是父親期望他成為李世民，還是日本人別有用心地勸他做「滿洲王」，他都不予理睬。至於問鼎中原，稱霸全國，他更是從來都沒有想過。他願意在「一個領袖」之下，實現他的報國濟民的宏偉抱負。

在張學良看來，就當時局勢而言，在各路軍閥中，以蔣介石為最有能力、也最有實力統一中國。原來，他把國共合作的第一次北伐的功績，全部記在了蔣介石的名下，從而堅定了「一個政黨，一個領袖」的信念；又兼早年對美、英的富國強兵十分嚮往，而蔣介石已然得到美、英的支持；且其反蘇、反共的政治傾向，與當時張學良的思想也是一致的。因此，早在東北「易幟」之前的一九二七年，張學良率軍南下時，就試圖與蔣介石聯絡，曾經致電蔣氏，希望能夠罷戰言和，共商國是，但未能如願。

第二年，他即主政東北，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東北三省的生存與發展。他認為，「要靖國難，報家仇，只有全國統一，才能全力對付日本」；「而欲速謀南北之統一，只有改旗易幟，才能擺脫勢孤力單的困境，才能利用統一的力量與日本相抗衡，保住東北免入日本之手，維護國家的主權和統一。」他的民族氣節和以民族利益為基準的高尚情懷，使他毅然決然擺脫日本的控制，歸順南京國民政府。

在中原大戰中，張學良更是直接救助了蔣介石。當時，南京國民政府雖然取得了形式上的統一，但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，各霸一方。蔣介石為鞏固自己的統治而進行的削弱地方實力派的「削藩」

行為，引起了閻錫山、馮玉祥、李宗仁等各派軍閥的不滿，聯合起來反蔣，導致了一九三〇年五月的中原混戰。四個多月時間，雙方相持不下，互有勝負。在這種情勢下，擁兵數十萬、雄踞東三省的張學良，「左袒」還是「右袒」，對於戰爭的結局具有決定性作用。在張學良看來，南京政府是全國統一的政府，只有支持這個政府，才能保證國內統一，也才能保住東北地盤不受外敵侵略。於是，亮出了「擁護中央」、「呼籲和平」的旗幟，同時派兵十萬進關，和平接收平津，中原戰事迅即結束，使蔣介石在政治上、軍事上穩操勝券，鋪平了通向神州霸主的道路。

張學良以為，靠著白山黑水和中原沃血換來的骨肉深情，應該是牢不可破的，因而，心裡充滿了踏實感、安全感；而渴望進入中心地位，以期一展長才的報國赤誠，更使他多年來緊緊地追隨在蔣介石的左右，沒有猜忌，不加防範，言聽計從，忠貞不渝。然而，實踐表明，他到底還是把人看錯了。

隨著東三省局勢的逆轉，蔣張之間的矛盾也在特殊關係的背後日益凸顯起來。「九·一八」事變以及熱河抗戰中，由於執行蔣介石的絕對不抵抗政策，造成大片國土淪亡，張學良在心理上遭受到極大的刺激，幾乎到了彷徨失措、無地自容的地步。而處此絕境，蔣介石卻並未施以援手，反而趁機在東北軍上大做手腳。這使得張學良有些心寒，思想上露出變化的痕跡。

原來，作為「蹙腳司令」的蔣介石，軍事方面雖然並無長策，卻是一個善於玩弄權術的出色政客。他從清代康乾二帝那裡學來一套駕馭部下的權謀，經常製造下屬間的矛盾，使其相互猜忌，形成派別，互不信任，以便於操縱、控制。在他的手下，什麼政學系、新政學系、〇〇系、太子系、中統、軍統，派系林立，矛盾重重。他故意引發他們相互監視，明爭暗鬥；自己則「坐山觀虎鬥」，

高踞上流，左右逢源，必要時分別施以小恩小惠，使之個個都覺得承恩受寵。

他的衡人尺規是，才能遠不如忠誠重要。因而用人唯親，一貫以人劃線。只要是黃埔系，浙江人，屬於他的嫡系，而且能夠鐵杆忠誠，即便是吃了敗仗，損兵失地，也照樣保他升官晉爵；反之，能力再強，功勞再大，也不予以信用。對非嫡系的重要人物，在使用的同時，還要進行分化、限制，防止其威脅到自己的統治。而對於需要拉攏的人，他可以指天誓日，結為異姓拜把兄弟；待到一朝成為競爭對手，或者毫無用處，便翻臉不認人，一腳踢開，甚至必欲除之而後快。

蔣桂戰爭前，他尊奉李宗仁為「忠實同志」，戰釁一開，便改口稱之為「黨國叛徒」。蔣馮戰爭前，他致電馮玉祥：「弟自入黨以來，未曾賣友，亦未曾殺戮革命同志一人。至若兄與弟，言公則兄為革命元勳，言私則我輩誓共生死。且兄又居弟之長，弟若稍有不利於兄之處，則人格破產，信用掃地。」但時隔不久，即將「仁兄」馮玉祥開除黨籍，下令拿辦。對於自己的這種朝三暮四，反覆無常，蔣氏本人曾力圖加以掩飾，他說：「處世做人的要道，在於隨機應變。」

臺灣作家李敖算是把他看透了：

蔣介石一生中喜歡以異姓昆弟之交拉攏人，拉拉扯扯，拉幫結派，但無一個真心朋友。與蔣結交的人無一有好下場。這就是蔣介石的為人。

一石雙鳥

張學良自然也不例外。他在蔣介石心目中，充其量只是一個幫手，而絕非嫡系。急難中可以籠

絡、利用，卻不能視同股肱，托為心腹。如同俗話所說的：「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」

「易幟」之後不過半年，一九二九年七月，蔣在北平接見張學良，授意他以武力接管中東路，以防止「赤化」，即使最後與蘇聯斷交亦在所不惜；並答應「一旦中蘇開戰，中央可出兵十萬，撥幾百萬元軍費」。結果，戰事一開，東北軍即連遭敗北，一個旅長戰死，另一個旅旅長以下七千人被俘，團長多人陣亡，黑龍江艦隊全軍覆沒。而蔣氏則「食言而肥」，以討伐西北軍為藉口，一兵未出，一文未撥。

對此，顧維鈞作出分析：「蔣介石的目的是使無充分外交經驗的張學良誘入圈套，陷於對俄的困境，使之必須依賴南京，這樣，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。」蔣在當時的日記中有這樣一句話：「唯吾人深望能達到（對蘇）絕交目的，而復對國內共黨方面有澈底辦法耳。」可說是老謀深算，一箭雙雕。

同樣目的，同樣手法，蔣介石後來又用在驅使東北軍「剿共」上。正由於他始終將張學良視為異己軍閥，因此，在處理過桂系之後，就著手解決西北問題。在他看來，西北問題十分複雜，既有共產黨與紅軍的問題，還有張學良東北軍的問題。於是，一九三五年九月，急令東北軍開赴西北「剿共」，任命張學良為「西北剿匪總司令部」副司令，代理總司令職務。蔣介石向來都是借「剿匪」之名行「削藩」之實的，讓地方軍閥與中共互相消耗，自己好坐收漁人之利。

此際，他的險惡用心正是「一石雙鳥」——既可利用東北軍消滅紅軍，又能藉以消耗東北軍的有生力量。為了控制張學良及其軍隊，蔣氏往裡面派駐了多名親信：侍從室主任作為參謀長控制軍事樞紐；「十三太保」第一太保掌管張學良的政治動向；貼身侍從負責東北軍的情報工作。同時，

把中央軍調到東北軍的背後，以防不測。這樣，東北軍就處於腹背受敵的困境，抬頭面對紅軍的槍口，回過頭來，又有中央軍的槍口對著他們。

當時有過這樣一幅漫畫：兩堵高牆巍然矗立，細看，左側是由滾滾人潮組成的「銅牆鐵壁」，右側是寒光閃閃的劍樹刀山；中間狂奔亂跳著一頭猛牛；前面明明有一條通道，卻被鐵絲網罩上，掛著一個「不許攘外」的牌子；身後，一個西裝革履的光頭紳士，手裡揮舞著文明棍，在督促著猛牛，讓它向左側的「人牆」衝去，結果，一衝一個跟頭，最後，弄得破頭流血，而那個光頭紳士卻用文明棍不住地戳著牛的屁股，強迫它繼續衝向人群，在走投無路的困境中，猛牛回轉頭來衝向主人，用雙角狠狠地把他攢在地下。漫畫的題目只有一個字：〈逼〉，大體上反映了當時的現實情境。

東北軍進攻陝北紅軍不足兩個月，損失兵力達三個師之多。當張學良請求蔣介石給予補充時，蔣介石的答覆卻是：「中央沒有機動兵員，所損各部，番號自行取消。」更令他難以接受的，是請求對兩位陣亡的師長每人發給十萬元特恤金，也被駁了回來。張學良慨歎：「我張某人混得連十萬塊錢都不值了！」傷心、失望之餘，張學良開始領悟到，東北軍不管怎麼賣命，終究擺脫不了受制遭劫的命運。生存尚且不保，更何談抗日復土，洗亡國之恥，報殺父之仇，雪「不抵抗將軍」之羞，救民族危亡之急呢！

他曾不只一次地說過：「只要有人能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出去，不論他是哪個階層的中國人，我願意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交給他，並且，我願意無條件地聽命於他。」現在，他看得非常清楚，真正抗日的是共產黨，是工農紅軍。於是，便加緊與陝北的共產黨秘密協商，雙方實現了實質上的和平共處。這件事當然為蔣介石所不容。於是，立即親赴西北督戰，並調集大批中央軍開赴潼關；同

時放出風去，要撤換「剿匪不力」的張學良。結果，使張學良的對立情緒更加激烈。

這次兵諫捉蔣，有兩條直接的導火線。一是當時全國抗日熱潮日益高漲，紀念「一二·九」學生愛國運動一周年的遊行請願活動席捲西安城。他們懇摯地對張學良說：「東北淪陷五年了，你還忍心打內戰嗎？我們願意為救國而犧牲，打回東北老家去！」整個請願隊伍，頂著凜冽的寒風，哭聲、吼聲響成一片，張學良也禁不住失聲痛哭。他當眾表示：「我的槍絕不打自己人。你們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，一定保證實現，一星期內用事實答覆你們。」當晚，他就把學生的要求轉達給蔣介石。回答卻是：「對學生就應該用機關槍打！」這使他異常震驚，也極度失望，知道了靠規勸已經無濟於事，於是斷然決定對蔣實行兵諫，用武力迫使他改弦更張。

二是，在這同一天，蔣介石寫信給陝西省主席邵力子，讓他密囑《大公報》發表削奪張學良、楊虎城兵權而由蔣鼎文取代的消息。此前，蔣氏曾依次召見邵力子及東北軍、十七路軍師長以上高級將領，而唯獨把張、楊排斥在外，致使二人深感憂懼，從而更加堅定了他們捉蔣的決心。

應該說，兵諫一舉，既非蓄意擺脫蔣的領導，更沒有謀害他的用心，只是要逼他抗日，可說是傳統的「忠君愛國」思想行為的「變型」。這種「忠君」是以愛國為前提的，用兵諫的手段，達成維護國家民族利益與個人湔羞雪恥相統一的目的，不失為彼時彼地張學良的最佳抉擇。

在西安、南京和中共三方的共同努力下，事變得以太平解決。為了維護蔣介石的「領袖威信」，使他對聯合抗日的「口頭承諾」不至反悔，張學良將軍毅然決定親自送蔣回寧，向世人表明了他一不爭權、二不爭地，為了實現共同抗日而置個人安危、生死於不顧的耿耿赤誠。

「誤把溪聲當雨聲」

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，蔣介石回到南京不久，即施行無情的報復。張學良原以為，蔣氏要他「寫一個認罪的東西，以便向南京百官有一個交代」，只是作「應景文章」，很快他就可以獲釋。豈料，茫茫無際的囚禁生涯就此開始，一押就是五十四年！

張學良遭到軟禁之後，許多要人都為之說情，其中包括宋子文、宋美齡等「皇親國戚」，李烈鈞、于右任等國民黨元老，張治中等「朝中重臣」，以及外籍顧問端納等。一九三七年一月，東北軍、西北軍共同致電蔣介石，要求給予張學良帶兵的自由。蔣說，張學良他自己要求讀書，我怎麼辦？同年七月，抗日戰爭爆發，東北軍將領再次提出把上陣殺敵自由還給張學良，蔣仍置之不理；而在召見東北軍代表時，他卻說：「漢卿他年輕，小事聰明，大事糊塗，只因讀書太少。我留他在這裡，讓他多讀些書。」

九年過去了，全國政協會上，委員們呼籲還給張學良人身自由，蔣介石讓邵力子出來代他講話，說：「張學良的問題不是國法問題，而是家法問題，你們不要管啦！」同年十月，張學良請托前來探望他的張治中在蔣面前代為說情，結果，蔣斷然下令：今後任何人見張，都要經他親自批准。

一九四九年一月，蔣被迫下野，于右任提出，為了增加與中共談判的籌碼，應儘快放出張、楊。蔣卻冷冷地說，你們找李宗仁去說。李宗仁倒是真的答應了，當即給參謀總長顧祝同拍電報，要他負責落實。顧祝同深解蔣介石的用心，便推脫說，這要由臺灣省主席陳誠和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張群來辦。於是，李宗仁又派遣程思遠去臺協商。陳誠說，蔣先生的事，他不便插手；而私下裡，遵照蔣的指令把張學良秘密轉移，程思遠無功而返。同年年底，蔣下達手諭：要嚴格審查張學良寄出的

信件，這就把通訊自由也剝奪了。

在曠日持久的拘禁生涯中，張學良自己也曾多次向蔣介石上書求救，主動承擔「罪責」，以求寬宥；請纓赴戰，要與日寇決一勝負，「任何職務，任何階級，皆所不辭。能使我之血得染敵襟，死得其願矣」；表述「加意鍛煉身心，休養體智，以備釣座之驅使，代國家之馳騁」，「乞釣座念及十年之情，憐及匹夫之志，有以成之」的心願。無奈，熱面孔貼在冷屁股上，回回都是「竹籃提水」。蔣介石的策略，一曰置若罔聞，不予理睬；二曰水來土掩，虛與委蛇。

一次，戴笠向蔣介石報告，說：「張學良太小氣，連一根釣魚竿也捨不得買。」蔣介石卻說：「你懂什麼，這是暗示我，要他釣魚必須釋放他，要給他政治權力的釣魚竿。」不久，他就叫人把一根從美國進口的高級魚竿送過去。張學良看到這個魚竿能伸能縮，可長可短，知道他的用意，當即折斷扔掉。對於長期喪失自由，身心飽受摧殘，張學良以獨特的方式向蔣介石提出抗議：他特意捉了一隻鳥，把它關進一個精緻的鳥籠裡，然後作為一件特殊禮品，托人給蔣介石送過去。蔣介石收到後，將計就計，差人做了個更大的鳥籠，作為回贈，派人送給張學良，並捎話說：「我很愛鳥，你再在山上多捉些鳥吧，我有的是籠子。」

一九五六年，張學良鐵窗生涯熬過了二十個春秋，羈身臺灣孤島也已整整十年，又正趕上老蔣七十壽誕，張學良抱著很大希望，把一隻珍貴的瑞士名錶作為禮物托人送給蔣介石，暗示歲月蹉跎，「管束」應該結束了。蔣介石深知個中寓意，立即回贈一本一九三六年年曆，還有一雙繡花拖鞋。看得出他對西安事變那場羞辱始終耿耿於懷，決意要把「管束」永遠拖下去，直到張學良老死。

悵惘中，張學良寫下一首〈夏日井上溫泉即事〉，以自嘲形式形象地描述其懊惱的心境：

落日西沉盼晚晴，黑雲片起月難明。

枕中不寐尋詩句，誤把溪聲當雨聲。

正如他自己所說的：「一生最大的弱點就是輕信。」為此，他不知付出了多少慘痛的代價。

「不可放虎」

說到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的心理反應，包括對張學良的態度，可以用「一怕二恨」四個字來加以概括。其實，這個問題弄清楚了，也就能夠回答：蔣介石何以長期扣住張學良不放？

首先說怕。有一次，美籍著名史學家唐德剛問張學良：「漢公，為什麼蔣先生不放你？」張學良沒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引用了國民黨元老張群的一句話：

張岳公曾告訴我，他說，你是個寶貝，誰把你抓住，對誰就有用。你明白這句話嗎？那意思就是怕共產黨抓住我，怕我跑到共產黨那邊去。

看來，張學良的「虎」威猶在，是其不能獲釋的重要原因。

在中原大戰中，張學良一麾出守，舉重若輕，談笑間化干戈為玉帛，原因在於他手下擁有一支強大的東北軍，成了當時全國的最大的實力派。在蔣介石心目中，張學良是一隻威震神州的真正的東北虎；而那場震驚中外，至今思之猶使蔣介石心膽俱寒的西安事變，更使他領略了這隻桀驁不馴、

野性十足的東北虎的赫赫神威；現如今，雖說已經「虎落平陽」，但只要獲得自由，他仍然能夠憑藉他的老本、他的餘威，振臂一呼，「嘯聚山林」，成為有影響、有實力的統帥，繼續率領東北軍橫行天下。

行伍出身的蔣介石深知，軍隊就是命根子，有了軍隊就意味着有了一切。西安事變前，紅軍、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，在抗日救國大旗下，相互合作，形成了時人所稱的「三位一體」，總兵力達數十萬之眾。事變之後，這支武裝力量並沒有消亡，作為「東北王」，張學良既是東北軍的主心骨，同時也是「三位一體」的重要支柱。扣住他不放，無疑是渙散以至瓦解東北軍以至「三位一體」的關鍵所在；而「三位一體」內部離心力的日益加劇，又為蔣介石長期扣押張學良提供了信心和保證。

楊虎城的話，可謂一語破的：

張漢卿不回來，我們的事很難辦。首先就是團結問題。東北軍內部本來就不夠團結，他們與我們之間也不是沒有問題。張漢卿能回來，東北軍內部有個中心，就不會出大問題，東北軍與我們之間的合作也就比較容易。能團結，就有力量。張漢卿不回來，整個團結成問題，我個人實在撐持不了這個局面。

正是基於這一考慮，蔣介石才決心把張學良扣押到底。每當歷史出現轉折時刻，或發生重大變故，蔣介石都要親自過問對張學良的監禁事宜，唯恐出現意外。一九四六年春，在重慶召開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，中共正式亮出「釋放張學良」的議題，蔣介石十分緊張，立即緊急部署，匆匆忙

忙將張學良秘密押解到孤島臺灣，為的是怕他在大陸被劫走，或者迫於政治壓力被釋放出去。押解到臺灣以後，他仍然嚴加控制，因為他擔心，張學良一旦「出山」，就會「成為一股政治力量，為反蔣的人所利用，干擾國民黨的『改造計劃』和『強人政治』」。

直到臨終前，在同「後主」蔣經國談到張學良時，他還鄭重交代：「不可放虎！」中國古人有「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」的說法。張學良當時大概沒有料到，他的這位「關懷之殷，情同骨肉」的老上級，關於他的臨終囑告，竟是這樣斷義絕情的四個字。

這樣決絕的交代，顯然不是隨意做出的。那麼，其意為何？是怕他「東山再起」，重新「占山為王」嗎？看來不像。——當年的「山」已經不復存在了；而且，被囚禁了三十八年、已經七十五高齡的老將軍，縱然不是「一飯三遺矢矣」，昔日的震山之威，難道還存在嗎？他身後的三十萬大軍已然「灰飛煙滅」，莫非說一個「筮筮子立，形影相弔」的孤老頭子，還能揭竿而起，重新向蔣家王朝發難嗎？看來，只能有一種解釋，那就是：他害怕口無遮攔的張學良獲得自由後，會在接受各種媒體採訪時，披露出種種於他不利，有損於他的「光輝形象」的內幕。

再來說恨。蔣介石當然對張學良憤恨至極了。一恨張學良挑戰了他的絕對權威，讓他顏面無光，威信掃地；二恨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，促成抗日統一戰線，共產黨死裡逃生，趁機壯大實力，最後國民黨一垮到底。事變之後，蔣介石曾說：「此時抗日，坐大中共」；「八年剿匪之功，預期將於兩星期內可竟全功者，竟坐此役，幾乎墜於一旦。」三恨張學良始終堅守誠信原則，不作違心之言，不肯悔「罪」認「錯」。

凡是瞭解蔣介石的個性、洞悉其為人的人，都知道張學良一經陷入他的牢籠，便是「肉包子打

狗——有去無回」。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曾經說過，蔣介石為人私欲過重，缺乏忠誠，氣量狹小，睚眦必報，不足以為民族復興的領袖。另一位元老續范亭在談到西安事變時，指出：

漢卿又一時失策，親自把蔣送回南京。蔣介石的秉性是世人皆知的，他地地道道就是《紅樓夢》中的那兩句話：「子係中山狼，得志便猖狂。」果然，他一緩手就把漢卿給囚禁起來，再無出頭之日了。

由此，可以得出結論，蔣介石強烈的報復心理，是張學良不能獲釋的直接原因。當年西太后有一句經典的話：「誰若不讓我痛快一時，我就讓他痛苦一世。」蔣介石比西太后狡猾，他不說出來，實際做得更狠毒、更厲害：你張學良不是讓我委屈十四天嘛，那我就一報還一報，還你個一千四百個十四天！結果，足足監押了五十四年。

太史公曰：「怨毒之於人甚矣哉！」旨哉斯言。